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4月13日 第B4版)

六、拆迁

任何一个人在外感到压力，一旦回到了家，一切因家的安稳而心静，因亲情而温暖，因私密而松弛。住着多年老宅，摩挲珍贵的物件，觉得岁月依旧安好。李宗恩一向认为新政权的好歹仅仅是个自由度的问题，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还会根深蒂固地继续下去。谁承想是这个德行！老物件、老亲友、老嗜好、老做派，在日久天长与不知不觉中，构成了他个性的通达饱满，乃至取得生命的某种平衡。现在自己动手对家做彻底拆除，其内心感情是很强烈的。他知道：以传统文化材料构成的精神性的安详世界以后不复存在。那些饱含手泽的旧之气息，亦随之而去。

让我意想不到的，在发配边陲的前夕，李宗恩还做了另外一些事——

8月1日晚，去人民剧场看剧《林海雪原》；

8月5日和家人去文化宫散步；

8月17日带着孩子（苏苏）到吉祥戏院看戏；

8月23日和夫人观赏宽银幕电影《两姐妹》，之后在大同酒家晚餐；

8月27日晚，去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晚会；

9月上旬，李宗恩夫妇最后一次参观故宫。

9月15日离京，14日晚李氏家族在和平宾馆聚餐。

……

这又是什么？是北京人所说的“找乐”吗？当然不是。自身经历告诉我：身处乱世或遭遇不测，人真的需要干点别的，如逛公园、下围棋、看展览、听音乐、去餐馆……借以暂时摆脱某种社会角色所引起的心理负担和精神重压。1958年以后，我跟着张伯驹夫人学画。故宫如有画展，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张伯驹先生和夫人一定带我去参观。可到了故宫，张先生并不怎么看展品，甚至根本不看，而是抄着手站立一侧，样子悠闲，神情散淡，极有耐性地等着我把展品看完。出了神武门，他还非要夫人找个餐馆一起午餐。人在政治狂乱中所维护与坚持的一点点“趣味”，多么珍贵！

拆一个家，带走了一分命。

七、远行

1958年，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基本完

毕。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又划又戴”，但都留住在北京；“戴帽”的李宗恩则被狂风吹至远处，“北走燕，南走楚，东走齐，西走蜀”，他走得最远，由蜀而滇。于9月15日，携夫人来到昆明，暂住昆明旅馆。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共云南省委报道。9月17日，昆明医学院派车将李宗恩夫妇接到附属医院，在指定医学院教职员宿舍住宿，在附属医院食堂用膳。北京的家，已经“一锅端”。供职几十载的协和，已于己无干。难道还有什么徘徊不去的事吗？没有了。他面对的只是一种必须接受现实，准备过一种被迫的生活。

李宗恩开始着手“过日子”——第二天，他到南坪街理发；

之后，上街买日常用品；

之后，买点水果；

之后，和夫人打扫房间；

之后，到食堂买饭票；

之后，他到医院挂号请医生开安眠药处方；

之后，到图书馆，借一本阿英的小说；

之后……

对昆医的安排，唯一不能适应的是宿舍楼的公用厕所，他能适应头上的“帽子”，却怎么也适应不了胯下的“蹲坑”。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到昆医找到负责后勤的某科长，请代做一个“大便凳”。

夫妻相对，行坐相怜，真的切断了过去的联系了吗？没有。我在李氏日记里吃惊地看到，李宗恩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就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写去一封信，并亲自上街到邮局将信寄出。我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农工党写信？

10月3号上午，李宗恩见到党委书记和院长，嘱其翌日在内科门诊上班。要工作了！兴奋的他下午就跑到市内购物，买了一个听诊器。我也纳闷：一个省级医院的门诊部，难道不给医生配备听诊器么？哪怕是右派，不也是医生么？兴许李宗恩要买一个更新的或更好的吧？

每天在门诊部忙碌，有时晚间值班。自己是右派分子，需时时谨慎，刻刻小心，数月间也很少写日记。用他的话来解释，就是“无特殊情况可记录”。说是“无特殊情况”，但当地卫生界人士都知道有个从北京来的大夫到昆明的医院看门诊了。街巷深深，依然识得春风面。

1960年，中央有人来视察，说了一

句：“李宗恩年老体弱，不宜看门诊。”昆医立即做出调整，4月26日突然通知67岁的李宗恩，调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期刊中的资料。服从调动的李宗恩，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干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由于英文超好和专业超强，整理外国医学期刊自是驾轻就熟，甚至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一年过去，1961年5月8日，他给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写了一封信。在寄去全年党费的同时，写下这样的话——

“我调来图书馆已一年了，服务一直在期刊组。年初以来，因人事调动，本来三个人的工作现在由我一人负责。

在党的领导下和同事们的帮助下能够按期完成任务。以往每周参加园地劳动，身体有了锻炼。最近因关节常常隐痛，组织又让我做些室内清洁卫生工作，给我时间练太极拳，很有帮助。

在政治学习方面，除经常参加馆内布置的集体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参阅些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它的经济基础、殖民政策及几方面的资料；对垄断资本的认识有所提高。最近对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科学发展方向的被歪曲和技术进步的被阻碍结合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个小结汇报给组织。一个月前组织让我参加医学院教职员的神仙会学习，我有决心做好我的工作，加紧自己的改造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耐心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照顾。

兹随函汇上人民币¥17.28作为我的1961全年党费，请查收是可。61.5.8”

李宗恩很想加紧改造自己。在紧接着的一篇日记里，李宗恩又写下这样的文字：

对于改造：一方面有迫切愿望能够早日揭掉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1）年龄不让我一拖再拖，（2）改善处境，（3）改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自己亦承认改造成绩不大，对自己要求不够迫切。

是的，李宗恩心底有一个盼头，很强烈，很急切，那就是盼着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结束被贬斥的地位和被孤立的处境，重返人民队伍。“改造”的好坏直接联系着“摘帽”，“摘帽”联系着政治身份，联系着个人处境，联系着家庭子女，联系着饭碗，联系着未来。



1950年代昆明医学院图书馆

所以，李宗恩“自觉”改造，何况年龄也不容他一拖再拖。要求“摘帽”是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普遍又强烈的愿望，并非李宗恩所独有，罗隆基、储安平也希望“摘帽”。如果说有谁例外的话，章伯钧可以算一个。他说了：“反右需要一个标本，我就是标本。”

至于今后的打算，李宗恩的要求不高，无非是想回到从前，回到“队伍”。这个“从前”不是再去当协和院长，而是当一个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老百姓，只为求得社会接纳与家庭的融洽。一个以治病救人为业、以人道为本、一心崇尚科学的人从北京贬昆明，从住独栋洋楼贬到住两间宿舍，从院士、名医贬到图书管理员，从受到尊崇到遭遇冷眼，其内心要经历怎样的煎熬和挣扎，才能与这个不公正的时代取得平衡？一切皆有所问，却无所答。人的荣辱穷通，是否只系于际遇，并不关乎修行、人品和愚智？李宗恩六十余年，求学、出国、行医、教学，奉行人道，服务人类等所有初衷，在新政权掌管下都未能如愿，而最后的结果又都是适得其反。平生百事来心上，经不住细想。

在图书馆呆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思考，李宗恩向领导提出希望回到老本行。这样，人又从图书馆回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上班，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服务周到的他，能忘记自己是右派，也能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李宗恩不但给患者看病，还就提高改进门诊工作效率，提出了改进方法，被采纳后，立见成效。当时昆医的副院长蓝瑚是法国留学生，他对“李宗恩整理门诊部秩序的成绩”评价很高，非但不在意他的右派身份，反而觉得恰恰因其发配西南边陲，自己才有幸结识这位医学大家。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